

潭柘紫石砚熠熠生辉

袁树森

潭柘紫石砚用潭柘寺镇阳坡园村附近老虎山出产的紫石雕刻而成，石质细腻坚硬，颗粒均匀，易发墨，不损毫，储水不涸，是与端砚相媲美的美砚。明代英宗正统年间，皇家特设制砚作坊，把潭柘紫石砚作为皇帝用以赏赐给大臣们的皇家御砚，民间不准持有，使得潭柘紫石砚在民间绝迹600多年。

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北京市委副主任范旭光同志偶然发现，潭柘紫石是制作砚台的好材料，便派人采来紫石进行试制，但是命运多舛，一直未能如愿。

1986年，在有关领导的直接推动下，潭柘紫石砚终于在门头沟区九龙玉器厂（潭柘紫石砚厂的前身）再生了。潭柘紫石砚雕刻精美，是在宫廷御砚传人杨俊明的指导下试制成功的，为北京市填补了一项空白。这个项目列入了北京市“星火计划”。

为扩大潭柘紫石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由北京市原市长焦若愚牵线搭桥，砚厂把一批砚中精品赠送给了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对此赠品无不爱惜不已。赠与邓小平同志的是“鹤鹿同春砚”，当时香港《星岛日报》用显著大字标题刊登了这则消息，题目是《潭柘紫石砚重放异彩，松青鹤寿进贡邓小平》。赠与胡耀邦总书记的是“随型荷叶砚”，总书记题写了“潭柘紫石砚好”的赞誉。此外还有赠与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海天旭日砚”、赠与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的“岁寒三友砚”、赠与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的“森虎平安砚”、赠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朱学范的“宋代抄手砚”，朱老题词为“紫石重磨”、“文房增辉”。赠与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杨汝岱的“海浪砚”，杨汝岱题写了“紫石生辉”的墨迹。

通过市工业部对外展览办公室主任、政府顾问苏立功同志的牵线搭桥，紫石砚厂向一些著名的书画家吴作人、周怀民、刘海粟、崔学范、阿老、肖芳、董辰生、李凌云、黄胄、黄苗子、舒同、李可染、溥杰、溥公雷、魏传统、张旭等人赠送了潭柘紫石砚，他们纷纷题词，对潭柘紫石砚表示赞赏。

由于潭柘紫石砚制作精良，蕴含有丰富的文化因素，因而成为了国家领导人赠给外国元首、政府高官的礼物之一。国家领导人赠送给新加坡资政李光耀的“汉代瓦砚”、为日本原首相福田制作过“汉代古历砚”、为日本原首相田中角荣制作的“龙龟砚”、为原韩国总理金大中制作的“宫廷龙凤砚”，等等。

朝鲜原领导人金正日从韩国报纸上看到用珍贵的制砚台的宫廷紫石镶嵌在奥运会纪念碑上的消息后，记在了心上。金正日接任首相后，责成外交部驻中国大使馆与中国外事部门联系，要制作一套十二生肖的潭柘紫石砚，用朝鲜文写了十篇要求。因当时的企业没有人懂朝鲜文，只好到语言学院请外文老师翻译。翻译成中文后才明白要求的内容，原来



金正日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要求把十长生、十长寿、梅兰竹菊、星光日月、松鹤延年、八仙过海等内容都雕刻在砚上，并且还要有朝鲜风格，例如服饰、信仰、代表朝鲜的散漫花卉等。这些内容要以深浅浮雕的形式表现出来。当时，北京市政府外事办的同志再三嘱咐，设计好图案后一定要送朝鲜驻中国大使馆确认后，再雕刻，按原意要求的书面形式写出图案的全部含义。两周后信息反馈回企业，金首相完全同意潭柘紫石砚厂设计的全部方案。于是紫石砚厂开始紧锣密鼓地忙起来，他们挑选最好的雕工，选最好的石料，十几道工艺流程，厂长亲自把关，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在设计图案中，除中国的文化外，有代表朝鲜山脉的白头山和朝鲜花卉金达莱（中国月季花），有朝鲜风格的服饰放在砚盖下面和砚的四角。在这些砚中，金正日首相要求在设计中也融入了宫廷御砚的元素，所以紫石砚厂最后给12方砚命名为“生肖御铭砚”。60天后外方按时前来取砚，国家外交部门和市政府外事办，门头沟区领导及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官员来到紫石砚厂，一切手续从简办理后，朝鲜官员提出要把所有制砚图纸在厂内烧掉，使这批名砚成为了绝品。但是砚台的式样已经深深地印在工匠们的脑子里了，这是擦不掉的。

紫石砚厂设计的全部方案。于是紫石砚厂开始紧锣密鼓地忙起来，他们挑选最好的雕工，选最好的石料，十几道工艺流程，厂长亲自把关，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在设计图案中，除中国的文化外，有代表朝鲜山脉的白头山和朝鲜花卉金达莱（中国月季花），有朝鲜风格的服饰放在砚盖下面和砚的四角。在这些砚中，金正日首相要求在设计中也融入了宫廷御砚的元素，所以紫石砚厂最后给12方砚命名为“生肖御铭砚”。60天后外方按时前来取砚，国家外交部门和市政府外事办，门头沟区领导及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官员来到紫石砚厂，一切手续从简办理后，朝鲜官员提出要把所有制砚图纸在厂内烧掉，使这批名砚成为了绝品。但是砚台的式样已经深深地印在工匠们的脑子里了，这是擦不掉的。



李全聪写兄弟诗

赵永高

大家都知道“六尺巷”的故事，是说邻居之间因一墙之宽的房根角而闹得不可开交，便给在外作官的亲戚写信，以求援助。而那作官的亲戚看过信后，回书一封，上写四句诗曰：

千里捎书为一墙，
让他三尺有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事主一见亲戚的来信，思想开放，主动让出了三尺。不想，对方也被感动了，同样让出了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就有了六尺宽的胡同。这就是妇孺皆知的“六尺巷”。

上述说的是邻里之间解决“房根角，地头子”之类问题的美谈。下面介绍一个发生在民国时期的门头沟区处理弟兄之间房地产业的榜样，即“李全聪写兄弟诗”。在古山村碣石有个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老人，叫李全聪，他读过私塾，学过国学，受过传统文化的熏陶，文化素质很高。据说，他活了90多岁，应该说与心胸开阔不无关系。如今，村里除了他的故事外，还在墙上留下了他亲手所写的一首《兄弟诗》，诗曰：

兄弟同胞一母生，
祖宗一业何须争。
一番相见一番恼，
能有几世为弟兄？

落款是：“岁在己巳仲秋之月明公晒之”。注意，这“己巳”之年是公元1929年，即民国十八年；这“仲秋”之月，应是农历八月；这“明公”，是明白事理之人；这“晒之”，则是客套话或自谦了，“晒”音shǎn，讥笑了。

俗话说：“诗言志”。李全聪兄弟四人，他是长兄。其父去世早，由他管理家事。据说，他二弟去世也早，对其弟媳和两个孩子更是特别照顾。在分家时，让其二弟媳先挑，接着老四再挑，然后是老三来挑，最后剩下两间旧房分给了自己。他主持新盖的两处新房给了弟媳和小四。这样的大哥别人还能说什么呢？

如今，在全区拆迁中发生的诸多家庭矛盾，常常闹到“第三调解室”，如果读读李全聪的兄弟诗，再看看李全聪分家的行动，应该说是会有触动的。

民初辞书 入藏“国图”

——藏书录之三

左慎五

20世纪50年代，有一位同学在外交学院学习英语。建国后，各出版社尚未出版《英汉/汉英辞典》。他遍寻北京东安市场、琉璃厂的中国书店、古旧书店，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他知道笔者的祖父民国初年在济南国立山东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就读，毕业后又在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长期执教，便问我家是否有英语辞典。我说许多古旧书都在山东老宅西房炕头上的四只火柴箱里，请他自己去选。事后他告诉我，一共取走辞书三册，原版教科书一册。

转瞬半个多世纪，此事早已忘怀。如今我们都

已进入耄耋之年。某日偶然会面，他说这几本书伴随他完成了学习和工作任务，理应“完璧归赵”。我抚摸着纸张泛黄、品相尚好的四册精装书，感慨良多，深情地对他说：“如果不是您长期借用、妥善保存，‘文革’中可能早已散失毁损或化为灰烬。”书名如下：

- (一)《汉英辞典》硬面精装，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年八月再版。
- (二)《袖珍英华成语辞典》硬面精装，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年十月再版。
- (三)《袖珍英汉辞林》软面精装，上海商务印

书馆，民国十年九月十三版。

(四)《麦克米伦新世纪英语读本》（第一册）英国格拉斯哥(Glasgow)，1908年原版。

2010年9月，经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联系，该馆新善本书库均查无此书，同意接受捐赠。当我双手接过盖有“国家图书馆”朱红印章的四份捐赠证书时，心情颇为激动。祖父在天之灵，得知他的藏书入藏国家图书馆，在恒温恒湿条件下永久保存，也一定会感到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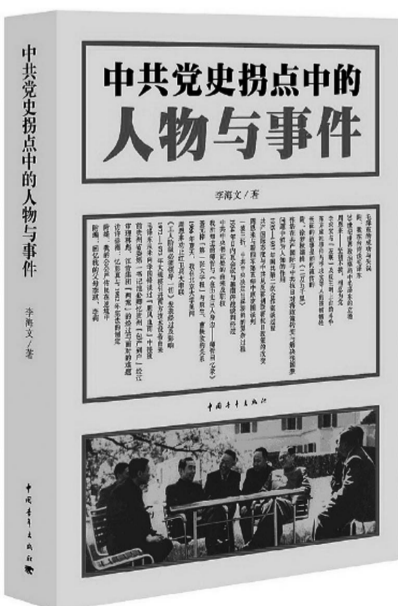
唯一的遗憾是，捐赠时未留下照片。



区文化委员会 区图书馆协办 推荐一本好书

在中共历史关键时刻

——读《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至今，已经走过艰难而辉煌的95年路程。95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新中国经济建设、十年“文革”、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时期。在中共党史的每个历史时期、每个历史“拐点”上，都有鲜为人知的重要人物与事件，影响着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前行方向。党史专家李海文著《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以下简称《中共党史拐点》），就为我们呈现了那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真实面貌。

《中共党史拐点》是作者30多年党史研究的结晶，书中收录的28篇文章，时间跨度从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涉及人物有毛泽东、周恩来、华国锋、彭真、张浩、师哲、李秋实、江青、聂元梓等，涉及时间节点和事件包括土地革命、反右明斗争、解决张国焘问题、二万五千里长征、国共第二次合作密

访、史料收集工作，才很好地还原了历史上党史人物与事件。如，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周恩来对动摇、悲观的叶挺说：“干革命不必自我。”但不久叶挺出走并滞留德国，脱离了革命队伍。经过10年观察学习思考，叶挺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抗战爆发后，叶挺见到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惭愧万分，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而我只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我常常想起你讲的那两句话‘总不能放弃革命不干，干革命不必自我’。”之后，在周恩来策划下，叶挺担任了新四军军长。

《中共党史拐点》探析了历史拐点中某些人物与事件关系，也揭示了某些人物与事件的地位作用。例如，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由于战斗频繁，形势紧张，项英曾下令销毁中央苏区留下的所有档案资料；王明在延安时治病的记录，竟被康生

收藏在家里，直到他死后才被曹轶欧交出来；再如，从1935年到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谈判期间，除潘汉年、董健吾发挥了“搭桥”作用，张子华也曾穿梭奔走在陕北、南京之间，为两党谈判合作起了重要作用。张子华当时年龄多大？“此时22岁，已有6年党龄”。

《中共党史拐点》以翔实的文献史料，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中共党史关键时刻的重要人物、事件。今天，我们阅读《中共党史拐点》等书籍，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走过的艰难而辉煌路程，认真践行弘扬实事求是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且有助于我们党保持清醒头脑，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团结带领亿万人民实现民族复兴、富强民主的“中国梦”！

张柱柱 / 文